

# 再度明确常态化监管 平台经济系上“安全带”

本报记者 李静 北京报道

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开幕。其中,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今年的重点工程之一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经济发展”。

近年来,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也给经济的健康发展、政府的监管体系及社会治理体系带来了一些挑战。在过去两年国家加强了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监管力度,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乱象、不合规的问题得到了遏制,企业也越发意识到合规的重要性。如今对于数据经济的监管正进入常态化阶段,对监管水平的要求也相应提高。

“规范发展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我国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继续保持在数字经济上的已有优势,否则不管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还是在支撑我国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上都会面临压力。”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梁正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说道,“促进平台经济更健康地发展,政府一方面需要去建立规则、定好边界,另一方面是做好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

## 乱象得到遏制,监管回归常态化

常态化监管则意味着监管规则的确定和监管行为的日常化,是贯穿经济运行全过程的常态化监管,同时也对政府的监管水平提出的更高要求。

在过去两年中,针对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在早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乱象,有关部门加强了监管。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工作重点。

2022年开始,多项重要会议对于数字经济的监管不断提及“常态化监管”。例如在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2022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监管,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2023年1月13日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表示,要切实提高常态化

监管水平,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支撑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中大显身手。

“过去为了促进平台经济的发展,平台经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野蛮生长,产生了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但同时产生了许多问题,典型的就平台经济凭借其巨大的体量和经济实力,实施垄断行为,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就是近几年国家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原因。”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旻对记者表示。

在过去几年数字经济的一些乱象被频繁曝光。其中的典型案例包括阿里巴巴因“二选一”垄断行为被处罚182.28亿元。罚款原因是由于阿里巴巴作为互联网电商的头部企业,实施“二选一”行为排除、限制了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竞争,妨碍了商品服务和资源要素

自由流通,影响了平台经济创新发展,故被处以巨额罚款。

经历了一年多的高强度反垄断监管、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大量的企业越发意识到合规的重要性,这也是监管进入常态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鹏对记者指出:“常态化监管对应的是以前运动式的监管,运动式监管指的是针对某一事项进行专项督察、阵发性的监管。这种运动式的监管一般来说时间短,有一定周期,没有固定人员,在专业性、能力性上相对较差。”

常态化监管则意味着监管规则的确定和监管行为的日常化,是贯穿经济运行全过程的常态化监管,同时也对政府的监管水平提出的更高要求。李旻说道:“过去的专项监管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让野蛮生长的互联网及平台经济规范化,资本无序扩张已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到,要促进平台经济的发展。

视觉中国/图

被有效遏制,但其中也出现了过度监管、一刀切等问题。常态化监管水平的提升是给监管措施以确定

性,明确政策红线,规范资本、平台企业的经营行为,引导企业自身规范发展。”

## 服务价值几何

2022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中大显身手。

“数字经济的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梁正对记者指出,“过去三年,中美在数字经济的一些领域上差距拉大,最典型的是中美数字经济企业上市公司的市值排名上,另外还有一些新业务美国也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例如最近各界谈论特别多的ChatGPT技术的发展。”

从我国近年来对数字经济特别是平台企业的监管变化来看,梁正认为,我国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规则,“我们已经把数字经济发展的脉络理清了,并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在此基础上政府就可以依

法监管,数字经济也才能够健康成长。”梁正把对数字经济的规范发展比喻为驾驶汽车时系上“安全带”,因为新业态普遍面临监管上的空白,用旧的方式也不适合去管理它,规矩就像安全带一样,有了之后才可以放心地驾驶。

在过去几年,我国逐渐建立健全了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例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可以有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违法行为进行监管。

李旻认为,对数字经济进入常态化监管,意味着对资本及平台企业进一步松绑解压,国家引导企业自身规范发展,给予市场空间和弹性。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规模在全球范围领域之内增长速度非常快,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了非常大的力量。无论是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还是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多的就业岗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中的平台经济更是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技术进步与商业模式创新、带动就业创业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作为融合型经济,平台经济通过汇集信息、传导数据、整合资源、便利交易,集聚了海量的商家与消费者,推动商品生产、流通及配套服务高效融合,在数字

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枢纽作用。

2022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中大显身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要促进平台经济的发展。

对于企业来说,这样的信号意味着外部发展环境将进一步开放,市场空间及弹性也会进一步开放,平台企业将会有勇气去投资新产业、新领域。不过,增量研究院院长张奥平认为,平台经济作为经济发展中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的新兴领域之一,不应仅仅专注于挖掘人口流量红利,更要致力于建立在制度优势之上的技术创新,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在突破

“卡脖子”工程中争当排头兵、先遣队,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做贡献。

梁正则认为,对于政府来说,要想促进平台经济更加健康快速发展,政府可以像当年搞市场经济那样,把数字经济的基础要素提供好、基础设施建设好、营商环境塑造好。“一方面是数字经济要素方面的建设,例如资金、人才还有数字经济中最重要的数据(包括公共数据的开放、数据交易所的建设等);另一方面是规则的建立,把规则建立好了之后,要素才能顺畅流动,创新才能活跃涌现。”梁正说道。

# 两会“芯声”:加大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应提上日程

本报记者 秦淼 北京报道

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 人才短缺问题严重

近年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技术创新上不断取得突破。目前,制造工艺、封装技术、关键设备材料等领域发展趋势向好,企业实力稳定提高。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产业步入高速增长、经营改善、产品突破、环境优化的黄金时期,在设计、制造、封测等产业环节均涌现出一批新的龙头企业。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22年上半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销售额达到4763.5亿元,同比增

长16.1%。

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足。核心芯片产业仍处在扶植成长阶段,与国外产品存在一定差距,产业链韧性不足,人才短缺等问题。其中,人才短缺、产学研脱节问题尤为严重。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发展报告》显示,预计到2023年前后,全行业人才需求将达到76.65万人左右,其中人才缺口将达到20万人。目前,国内高校培养的集成电路专业人才却不到3万人/年。庞大的

创新主体地位。

集成电路作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也备受关注。《中国经营报》

人才缺口,直接导致整个芯片行业人才争抢严重。另外,据人社部预测,到2025年,智能制造领域人才需求将达900万人,人才缺口预计为450万人。

全国政协委员、“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邓中翰指出,后摩尔时代,我国一直存在科技人才不足的问题。目前,不仅缺乏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也缺乏通用的工程技术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指

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高端人才和行业经验积累存在较大差距,国内高端师资、工程技术人才稀缺,国外一流人才引进困难。

记者注意到,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围绕CPU、汽车芯片、人工智能芯片、集成电路封测、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等建言献策。

民盟中央梳理了当前我国人工智能芯片行业发展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提到根据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发布的数据,人工智能不同技术方向岗位的人才供需比均低于0.4,其中人工智能芯片岗位人才供需比为0.32,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人才供需比仅为0.2。



近年来,我国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和集成电路学院建设一直是发展的重点。视觉中国/图

## 切忌“一哄而上”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和集成电路学院建设一直是发展的重点。2003年,国家启动建设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基地;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发文,公布首批9所建设和17所筹建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的高校名单;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支持中央高校建设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平台项目。

截至2022年5月,我国已建成国家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以及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高校达29所,其中985高校23所。与此同时,我国也在不断加强相关学科建设,2020年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2021年公布首批“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8所,2022年补充新增6所。此外,与集成电路相关的二级学科8个、自主设置交叉学科6个。

刘忠范认为,推动高校设

立“集成电路学院”和强化相关学科建设是解决我国芯片产业“卡脖子”问题的战略布局值得肯定,但是需要把握好“度”,不能一拥而上。他建议,高校应从体制机制上强化已有各相关专业院系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联动,公布首批9所建设和17所筹建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的高校名单;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支持中央高校建设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平台项目。

邓中翰也指出,尽管政府已经意识到人才问题的严重性,不断出台人才培养的计划,但人才培养需要时间,以及全社会的通力合作。邓中翰建议,除了高校加大力度培养人才,科技企业等也需要承担着人才的培养工作,有针对性地培养行业需要的人才。因此,需要政府给企业和人才更多的吸引政策和保障力度等,保证有源源不断的全方位高水平人才。

## 多举措培养高端人才

围绕人才建设,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从加强政策引导、加强学科建设等方面带来自己的建议。

民盟中央认为,加大投资力度,加速高端芯片制造落地,平衡芯片产业布局,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奠定基石;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新增跨专业交叉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积极探究有效的商业体系,发挥统一大市场的红利,实现更高效的内循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实现自主可控,围绕芯片产业做好锻长板、补短板、强企业三方面工作。

“首先,要恢复半导体物理专业。”全国人大代表、方大集团董事长熊建明建议,由于各种原因,我

国从事半导体物理研究的人员数量很少,应当尽快恢复半导体物理专业。支持优质课程开发、升级教育实验室设施设备,引进海外优秀半导体顶尖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席商华提出,将集成电路与软件纳入高考“强基计划”。他表示,要单设集成电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实施“3+2”的本硕博贯通、“3+4”的本硕博贯通、“2+3”硕博贯通等特别培养计划,支持符合条件的学院超常规培养集成电路和软件交叉应用的复合高端人才;建立健全集成电路柔性人才引进机制,面向国际招揽在芯片领域及集成电路领域的顶级专家和学者。

除此之外,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希望各地方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得到重视。

其中,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黄宝荣,围绕人才建设,他建议支持高校建设“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兰州大学等高校开展“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试点建设,设立集成电路相关学科、开设定向培养班等;在甘肃省布局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等一批集成电路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广东省委副主委、广东工业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二级教授李丽

娟希望教育部支持广东开展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她提出,教育部可以大力支持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集成电路学院,支持广东高水平大学加快集成电路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建设;教育部大力支持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集成电路相关的国家级示范性软件学院等。

值得注意的是,3月2日,在“北京调研集成电路企业座谈会”上,国务院相关领导也指出,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用好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对国内人才给予一视同仁的优惠政策,对外籍专家给予真正的国民待遇,帮助企业加快引进和培养人才。